



东汉佛道文献 词汇新质研究

A Study on the Neologisms
of the Buddhist and Taoist Scriptur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俞理明 顾满林 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研究

A Study on the Neologisms of the Buddhist and
Taoist Scriptur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俞理明 顾满林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研究/俞理明,顾满林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7473-5

I. ①东… II. ①俞…②顾 III. ①佛经—词汇—研究②道藏—词汇—研究 IV. ①H131②B94③B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05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研究

俞理明 顾满林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473-5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0

定价: 75.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东汉的汉语	1
第二节 东汉佛教翻译用语的通俗倾向	2
第三节 汉译佛经用语的特点	3
第四节 东汉的道教文献	4
第五节 我们的词汇观和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材料的定位	5
第六节 使用者主观态度对词汇的影响	9
第七节 经济原则和衍余原则	10
第八节 研究材料的时间特性	12
第九节 本文的描写对象	15
第十节 本文描写的角度和原则	16
第十一节 本文的处理方法	19
第二章 名物篇	25
第一节 人物神灵	25
第二节 人体寿命	66
第三节 生物食品器具财货弃物	73
第四节 天文地理处所方位	91
第五节 智能意念	113
第六节 社会事物	141
第七节 称代指示	154
第三章 行为篇	160
第一节 有生行为	160
第二节 五官肢体行为	170
第三节 心理行为	211
第四节 人际行为	238

第五节 宗教修行·····	283
第六节 无生行为·····	289
第四章 性状篇·····	304
第一节 表象·····	304
第二节 性状·····	311
第三节 类属·····	331
第四节 数量·····	342
第五节 时间·····	350
第六节 范围·····	364
第七节 程度·····	378
第五章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分析·····	383
第一节 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的总貌·····	383
第二节 从社团角度看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	387
第三节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的表义情况·····	393
第四节 从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看汉语词汇复音化·····	408
第五节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的外来成分·····	413
第六节 东汉词汇新质中的意译词·····	420
参考文献·····	425
词目索引·····	430
后记·····	47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东汉的汉语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拥有数量巨大的使用者,分布在广阔的地域内,又跟其他语言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使它的内部情况十分复杂,形成众多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的频繁来往和交流会促使汉语内部趋同变化的发生;而地方中心意识、地理阻隔和与异族的接触交往情况不同,则引起不同地域中社团用语的差异,促使大量的变异产生、保留和扩大。这两种力量同时发生作用。

语言为满足交际而产生,广泛的社会交流的需求,有利于语言的趋同性变化。至少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使用雅言或通语的需要,并发出了“书同文”的呼声。“书同文”看来属文字问题,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它有促进语言书面形式规范的作用,并反过来对语言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趋同的要求影响书面语,导致文言的兴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文言的兴起与儒家有很密切的关系,儒家重视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也重视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所以在汉代得到统治者的倚重之后,“独尊儒术”不仅意味着在统治思想和方法上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文化传承和教育方面也体现儒家的一贯思想。儒家推崇的文献成为经典,成为教科书,潜移默化之中,这些经典的用语也成了书面用语的典范,文言逐渐形成。然而,书面用语的过度趋同造成新的差异,到东汉,文言和口语间有了明显的距离,并在当时文献中有所反映。

语言不断地发展变化,不同时期的汉语,前后相承,环环相扣,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一长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汉语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说是关键时期。我们给予东汉佛教和道教文献用语特别关注的理由是,始于两汉之际的佛教传入,在文化输入的同时,形成了一次大规模

的语言接触,而道教也在这个时期兴起。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佛教和道教文献,内容特殊,数量可观,语言风格不同往常,它们对后代汉语的影响有待研究和评价。大规模的外来影响、本土新的宗教思想兴起和汉语本身文白分化,集中发生在东汉末期,使之成为一个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段。

第二节 东汉佛教翻译用语的 通俗倾向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它在给汉民族带来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同时,也给汉语带来了大量新的成分。据现有资料考察,佛教传入不久,就出现了一大批汉译的佛教经文,在当时,这既是来自西域的传教者为传播佛教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土人士自身了解佛教的需求。

佛经的汉译是一项艰难而具开创意义的工作。佛教的思想观念与当时中国流传的各种思想观念差别很大,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事物、不同的行为习惯和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识,给佛经汉译带来了很多困难。而当时汉语言文之间已经出现的文白的差异,还要求翻译者作出语用的选择。

本来,佛经的翻译者有理由采用文言。因为这样可以使译文具有典范的色彩,从而增加它的权威性和对上层社会以及民众的影响力——这样做,也符合佛教重视感化上层人物的一贯传统。但是有几个因素制约了这样的选择,使译经用语明显地转向另一方面。

首先,是翻译者的文化素养。最初的佛经翻译者基本不能兼通胡汉语言,因此,参与经文翻译的,有两个方面的人:初晓汉语的胡人和略知胡语的汉人,他们互相配合,共同完成艰难的翻译工作。初晓汉语的胡人主要通过口头学习汉语,由于没有接触大量书本知识,他们对汉族的传统、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局限;而在汉人中,处于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是儒家所倡导的“兼济天下”,不得志者又多“独善其身”,只有在脱离主流的知识分子中,才会有人因感叹人生无常而对这种厌弃尘俗的宗教感兴趣,而这样的人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思想或主流文化具有一种逆反心理^①,这种离经叛道的心理,使他们背离位居正统的各种经典,不像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那样重视学习模仿古代圣贤的用语。以上

^① 参许理和 1959(1972 第二版)。

两方面人员的特点,使译文倾向于非文言化。

由于受到代表典雅文化的汉族知识阶层主流和中央政权的明确排斥,佛教自觉不自觉地带有通俗色彩,它的宣传对象也以通俗阶层为主,包括一些热衷于各种信仰的贵族和初通文墨的商人小吏等民众。这使佛经在翻译中具有较强的口语性。

早期翻译中,胡汉译人对于对方的语言,尤其是书面语的掌握还不够纯熟,很多地方不能做到一对一的细致理解,一些原文只能作笼统的解释。意义表达上遇到的障碍,使得译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达意方面。此外,译人还要考虑译文文体与原文风格一致,像偈颂那样在语言形式上有明确要求的诗歌体原文,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这些原因,都使得译人在用语上偏向于采用浅显易于表达的口语性成分,以适当降低工作的难度。这样做,也符合佛本人在传教用语方面入乡随俗的主张。

第三节 汉译佛经用语的特点

在早期佛经翻译用语中,出现了大量新质。形成这些新质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承载外来文化的外来语影响,一是与典范文献用语相异的汉语口语因素,它使汉译佛经的用语面貌,与当时已经形成的带有典范性的书面语很不一样。汉译佛经用语中的口语因素,我们曾经做过讨论^①,这里主要谈谈汉译佛经用语的外来因素。

在翻译工作中,对原典词语的处理,通常有两种手段,一是音译,一是意译。音译是仿照外语的读音按本语的发音习惯来表达,所以被称为借词,在汉语书面语中,借词可创用新字或借用旧字(只表音不表意)来记录。对本语来说,音译便捷并保持了跟外语的密切关系,但增加了跟语言系统中原有成分没有关系的、新的形式—意义结合体,增加了理解和记忆上的困难;而意译则利用本语的词或语素来表达外语的意义,通常不增加本语的语言形式,更易于理解和记忆。

意译在翻译中受到限制,这种限制首先来自本土人士的外语能力。在当时,即使对佛教了解较多的人士,也很少了解佛经所涉及的外国语言文化,要把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概念用本语表达出来,难度极大,远不如音译方便。然而,音译实际上相当于用本语的发音习惯说外语,不能满足与

^① 参俞理明 1987(《文汇报》1988.2.14,《人民日报》1988.2.21 分别摘要介绍)、1993。

本土人士沟通理解的要求。音译词的流行,要以原典用语在汉地一定程度的流行为基础,但是,当时来汉地的外语人群数量和社会影响都有限,一般汉人对外语的了解太少,所以,从翻译的角度来说,采用音译大多是不得已的,它不是理想的翻译手段。

因此,佛经用语的翻译,意译是主要的手段。从词汇层面来看,在意译用语中,有一部分词语因翻译而发生了引申性的意义变化,意译中也常常采用本语语素创造新词,但意译的重点在于,尽可能利用本语原有成分而少作改变。

所以,佛经中用语的外来影响,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1. 音译,它们的外来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2. 意译,翻译中把佛教概念和汉语原有的一些概念相比附,这些翻译用词与原词在意义上只是相似或近似,翻译它增加了一个外来的引申义。比较这个引申义和基础义之间的关系,有些比较密切,有的要生硬一些,不易理解。

3. 仿译,一些复合词以外语词为基础,对其中语素逐一对译。虽然这些语素的组合是汉语所允许,并且也可以通过汉语语素的组合关系来理解这类复合词的整体意义,但是,这些复合形式,在汉语中本来是没有的,其中语素的组合关系源自于外语。仿译成分在形式上是汉语的,但在内部的结构上和来源上却具有外来性,是汉语受外语刺激而出现的新成分。

4. 一些汉语中偶发的或不常用的成分,因翻译中使用而成为佛教用语或者全民用语的常用成分。

5. 翻译中对汉语成分的误解和不当使用,引发一些汉语成分的特殊用法。

可见,佛经汉译对汉语的影响,需要从多层次展开评价。

第四节 东汉的道教文献

汉代也是中国道教的孕育时期,当时出现的《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注》等著作通过对古代老子思想的阐发,为道教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其后出现的早期道教文献,也有以注释或阐述《老子》和《周易》的形式出现,如《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由于体裁的原因,这类文献的用语很容易受原典的影响而倾向典雅。但是,另外一些通俗的道教理论创立者走了另一条路,他们通过自己的独立著述来阐述道教思想,《太平经》就是这些道教

理论家的思想结晶。

《太平经》原本已经残缺,《正统道藏》中仅存《太平经》残卷五十七卷,二十多万字。本书是经过多人多次的增补充实而成,其中大多数篇章产生于汉代,可能有少量六朝人窜入的内容^①。和采用注释古书方式阐述道教思想的作品不同,《太平经》采用对话体,全书基本不引用古代文献或典故,通过天师和六方真人的对答,阐述他们的人生观和对社会的看法,用语平易,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实际。

此外,唐人《太平经钞》摘录《太平经》,许多已经缺佚的原经内容得以保存,可以部分弥补《太平经》本文残佚的缺憾。

《太平经》和汉代佛教译经有几方面相同:都是宗教性质的文献;反映社会非主流思想意识;在民间或下层有广泛影响;产生在汉末;大量采用对话方式;不以文言为基础用语而带有口语性;有适当数量的文献。

当然,二者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不同,比如:本土与外来的不同;话题和文化背景不同,内容差异较大;佛经翻译以洛阳为中心,而《太平经》的作者则在黄河下游活动。另外,写作者或翻译者的个人用语风格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如此,在同时的各种文献中,《太平经》与佛经较为接近,是比较适宜的比照材料。

第五节 我们的词汇观和 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材料的定位

汉语词汇的历史研究,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的不同。历时性研究多考察某些特定的词汇成分的历史变化,包括词义的历时演变或词的历时替换。词汇的共时研究,多以特定时段或特定对象为目标,着力于对词汇个体成分作逐一分析和研究,这样的研究解决了大量的词语解读方面的困难,成绩可观。但是,这种视角也使得词汇的研究显得零散和琐细,因此,有必要从宏观上对词汇的研究作一思考。为克服词汇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有学者注意到部分词之间的联系,比如以能产的构词语素为纽带对一组词作分析,或从词的行业性对词汇展开分析,或从词的意义关系展开分析,等等。不过,从整体上看,声称全面考察的各类研究,仍带有抽样性,考察对象在反

^① 如卷117“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二百八”对“乞丐之人”的抨击。

映词汇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面貌方面,明显不足。

根据“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和固定词组的总汇”^①这么一个界定,东汉的词汇应该是当时汉语词语的总汇。但是,文献在保存语言材料方面具有随机性,记录的内容、方式以及用语习惯,都会影响文献作者对词语的使用,因此,并非所有的东汉词汇成分都有机会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东汉文献中,肯定有相当数量的词汇成分没有被文献记载,或者虽然曾经记载后来却失传了。所以,保存至今的东汉词汇材料,对于整个东汉词汇而言,具有抽样性质。

东汉佛道文献中的词汇材料对于目前保存的所有东汉词汇材料而言,还有它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不仅由于这些材料本身不完整(比如文献缺佚),还在于佛教和道教对社会事物关注的倾向性。出于宗教本身的立足点,当时社会上某些事物受到他们的特别关注,而另一些事物则不受注意。这样,反映当时某些社会事物的词汇成分在这类文献中可能比较集中或比较细致,而反映另一部分事物的词汇成分在这些文献中很少出现或者完全没有出现,所以,对于词汇研究而言,一个时代的部分的文献又有更多的不完整因素,是一种有偏向的抽样材料。

不过,这种抽样性质的材料,对于词汇的研究来说,仍然具有典型意义。占据词汇主体地位、使用率高、流行面广的词汇成分,更多地被文献的记录者使用,它们进入我们视野的机会肯定比使用率低而流行面小的词汇成分高得多。同一时期的不同文献中,基本使用的词汇成分大体一致,差异比较明显的是那些使用范围和频率限制较多、为某些特殊语境服务的词汇成分。这些与文献特定内容有关的词汇成分,反映了这些材料本身的特点和当时一部分人的关注点。

词汇内部的各个部分发展是不平衡的,对词汇材料中特殊部分的考察,有助于了解这种不平衡,弄清不同词汇材料中保存的时代特点和社团特点,这是词汇历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

很多词汇学著作都主张词汇具有全民性,对于词汇全民性可能有两种理解:一、一种语言的使用者都掌握的词语有全民性,那些使用范围很窄、少数人使用的词语没有全民性;二、全民性指某种语言的全体使用者的用语,不论这些用语使用范围的大小。问题在于,一种语言中,总是有一批数量非常可观的词语只被个别的社交集团使用,而每个人都可能掌握一批流行不广的词语。那么,这些只被部分人或少数人使用的词语,还属于这种语言的

^① 参《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

词汇吗?

我们以为,立足于“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和固定词组的总汇”,词汇应该包括各种只有部分人使用的成分。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成分没有全民通行,就说它不属于这种语言或不是这种语言中的一个成分。简单地说,汉语的使用者,在说汉语时所用的所有词汇成分,不论多么生僻,都是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问题是不同的词汇成分在词汇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分汉语词汇内部的不同层面。

习惯上,词汇被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个部分,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说明词汇内部的复杂构成。考虑到词汇在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以为,词汇大致应该包括四个层次:

一、基本层,指那些长期稳定并且普遍使用的词汇成分;

二、通用层,指那些当时普遍使用但尚未经受历史选择,或虽长久使用但不太普遍的词汇成分;

三、局域层,指那些在某些语言社团内使用而缺乏全民普遍性的词汇成分,这些语言社团的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地域造成的,有的是行业造成的,有的与年龄、性别、文化教养、兴趣爱好或者语体等其他因素有关,因此,在这一层中还可以从自然(地域)区分和社会区分(行业、年龄、性别、文化、兴趣等)两个方面,再分为若干块;

四、边缘层,指即使在特定社团中也缺乏基础的词汇成分,比如已经淘汰而没有完全遗忘的旧词语,罕见的古语词,完全陌生的新造词、外来词,等等。

其中,基本层和通用层是词汇的主体部分,这两个部分的词汇成分,处在词汇的中心,普遍用于各种人群和各种交际场合。二者的差异在于历时性,基本层的成分具有很长的使用期,而通用层的成分还没有经受长时间的选择,不过,在共时的角度下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差异,甚至,一些通用层成分的使用率会比基本层成分高。局域层的词汇成分,适用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或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它们虽然缺乏普遍性或长期的适用性,但在局部范围内它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表现个体用语特色的重要因素。边缘层的词汇成分,使用者极少、通行度极低,没有正常交际功能,处在词汇的最外沿部分。对一次具体的交际来说,各层次的词汇成分出场机会不同,从主到次大体顺序是:基本层>通用层>局域层>边缘层。其中,局域层的成分一般不能单独完成交际过程,边缘层成分通常不用,它们必须依托于基本层和通用层的词汇成分。

当然,词语在词汇中的地位是变化的,特定社团的用语可以向其他社团

或全民范围扩散,原来在全民范围内使用的词语,到后来可能只保留在某个小范围内使用,曾经通行的词语可能不再使用,而一时不通行的词语将来可能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因此,词语在上述四个层面中的位置,通过语用实践,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断地移动。

根据上述的词汇观,我们以为,一种语言材料的基础或主体,是全民通行的基本层和通用层的词汇成分。同时,由于材料本身的语用特性,文献中会出现一些特定社团或特定场合使用的词汇成分,包括存古成分和新生成分,这些大多不是全民通行的。汉译佛经用语受到了大量外来影响,但是,作为一种以汉族人群为读者的文献,它的用语只有依附于汉语词汇的基本层和通用层,才可能达到与汉语使用者沟通的目的。同时,由于大量无法用当时汉语词汇成分表达的新观念的引入,佛教文献又需要使用很多特殊的词汇成分,包括大量的外来成分和创新成分,其中有的在佛教团体内部使用很稳定,以至后来为大众普遍熟悉,有的则很不稳定或昙花一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局域层和边缘层的词汇成分。比较而言,萌生于汉文化的道教文献材料的汉语特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样出于特殊的宗教思想表达的需要和自身的文体特点,道经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社团用词,与其他汉语文献用语中的词汇成分有所不同。本文讨论的词汇新质,就是这些文献中出现的词汇新形式、新含义和新用法,它们处在当时词汇的外缘。

因此,采用描写的手段,立足于对发展和变化的观察,利用佛道文献展开的汉语词汇历史研究,重点在于其中具有特异性的词汇新质,即分布在词汇局域层和边缘层中的宗教社团的用词,以及流俗大众中新起的词语。由此,我们可以从佛道社团的角度观察东汉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包括佛教和道教社团用词与汉语一般词汇的关系,以及佛道两大社团之间的词汇关系,并且,从佛道两教这样一个侧面了解当时汉语词汇的面貌。

对词汇新质观察的意义在于,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词汇的变化部分,虽然在这种变化中出现的新成分不一定都被全民接受,但是,对变化部分的观察,可以让我们了解佛道两教影响下当时词汇内部存在的发展点,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了解词汇发展中,新质对整个词汇的影响以及词汇新陈代谢的规律等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数据。

第六节 使用者主观态度对词汇的影响

语言作为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它的功能是表达思想。立足于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认识,可以说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这是不完全的,作为思想的表达工具,语言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仅表现在语言有表现主观意识的功能,也表现在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表达是经过主观加工的。人类认识世界,自然站在自身的角度,以人为中心,因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思想的表达,都带有先天的偏向性。我们可能根据主观的意愿,给予某些事物更多的关注,而忽略其他的事物,或者把某些事物联系在一起、混为一谈,而对另一些事物作刻意的区分。客观事物在语言中的反映,与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关注,或者关注程度的差异,直接相关;同时,也跟人们对事物的关联性和关联程度的认识有关。

词语表达概念,但是,词语和概念之间不是严格的一对一关系。一方面,概念具有概括性,一个概念下,包括相当数量的同类事物,有时可以再作细分;或者,把相似的概念加以合并。比如在汉语历史上,“马”根据年龄、毛色、体格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过数以百计的名称,反映不同特点的马之间的差别,反之,也可以把马和牛合称为“牲口”,混为一谈。对事物的关心程度,决定了表达上的精细或粗略,同时,出于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角度,会形成表达上的不同。因此,语言表达中,人们既可以用多个形式表达一个意义,形成词的同义关系,也可能用一个形式表达多个概念,形成多义词语。对事物的认识和分类的差异,影响了表达的形式。

很多时候,我们相信,客观外界的变化,包括自然的或者社会的变化,是引起语言变化的主要动因。但是,主观作用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概念和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严格而单一的对应关系,很多新事物被我们归入了旧有事物的分类中,用旧词语表达,结果只造成了旧形式内涵增大,而没有产生新的形式。另一方面,我们常常为旧有的事物或旧有的概念创造新的表达形式,通过词汇翻新产生新词。这样的现象,正反映了语言的任意性特点。

语言的创新要求出自多个方面,客观事物的变化固然引起语言的变化,主观认识的变化或者主观心理的某些需求也会引起语言的变化,关键是人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和态度。当人们的认识或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即使这

些事物不变,也会有新的表达需求发生。因此,词汇中出现的新成分,可能基于新概念,也可能只是旧概念的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反之,新概念可能采用一个新创形式表达,也可能依附于一个旧形式,给它增加一个新义。社会变化与词汇变化之间,不是直接的映射关系,社会的客观变化和人的主观选择,都是造成词汇变化的动力。

第七节 经济原则和衍馀原则

由于主观作用,有两条相反的原则活跃在语言应用中:经济原则和衍馀原则。这两条原则,在组合中影响语言形式的长度,在聚合中它们影响语言形式的个体数量,最终可能改变语言系统中各部分的比例,影响语言系统的面貌。

经济原则是指在语言表达上,采用更为简捷的方式,以达到省便的目的。经济原则作用于组合关系,使得表达某一意义的某个具体语言形式(比如语句或词)出现省略、简化等变化,长度缩短。经济原则对聚合的直接作用是,使得表达某个或某类意义的多个语言形式,个体减少,合并归一,使语言系统中的某些部分发生萎缩性的变化。经济原则可以使表达简略快捷,减轻学习和记忆负担,提高交际速度和效率。

经济原则在多数情况下对语言系统起简化作用,但在组合中出于经济目的产生的新形式,为聚合增添了新成员,反而导致聚合成员的增加,转为衍馀,这是它对聚合的间接作用。

衍馀原则是在语言表达中,采用更为繁复的方式,以达到强调、细化或准确分辨的目的。衍馀指意义不变的情况下,语言形式发生延长性的变化,导致繁复的组合形式的出现,比如同义连文、附增表示类名或属性的语素,等等。在衍馀原则作用下,聚合中表达某个意义的形式分化、增加、繁衍,使语言系统中的某个局部发生扩充性的变化。衍馀原则在表达上对所指意义有强化的作用,有助于表达各种细微的区别,可以使我们在表达中有更多的选择,使表达更为精密细致或准确生动。

这两条原则具有不同的语用特性。经济原则可以使我们在表达中避免繁冗累赘,而衍馀原则可以避免粗略草率,二者互有长短,各有所宜,相反相成。从总体上说,语言的发展是趋向繁复,衍馀是必然的,而经济原则是对衍馀的一种补救,衍馀是经济原则发生作用的前提。语言不能承受无限繁复的表达,但不可能无限止地简化,关键在于表达的需要。表达中,到底

是选择简略还是选择繁复,取决于对所表达内容的关心程度。关心程度高的内容,在表达上偏向于繁复,而关心程度低的内容,在表达上偏向于简略。有一些因素影响关心的程度:

1.事物与表达者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对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关心程度要高些。

2.事物给予我们的印象。给人印象深刻的事物,关心程度要高些。对人们的印象发生作用的,有时是事物的新奇程度或对人的刺激程度,新鲜事物或新的信息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引发较高的关心程度,而见惯不经、习以为常的事物会使人漫不经心甚至视而不见。

3.对于事物差别的关注。对于有必要区分的事物,我们会给予更多的关心,或者我们会特别在意某些事物的某些特征,而努力在表达中体现出来,因此提高了表达中的关心程度。

4.我们对事物认识水平或观察了解的程度。观察细致、认识深刻的事物,关心程度要高些。

5.个人态度。个人是否重视,产生了强调和淡化的需要,出于强调的需要,我们会提高自己的关心程度;反之,对于想要淡化的内容,则会在表达中降低对它们的关心程度。

6.语用环境对表达态度的影响,庄重严肃的气氛会提高表达的关心程度,而在休闲放松的时候,关心程度就会降低。

以上因素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发生作用。同样的概念,在交际中受关心程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词汇需求,从而引起变化。

因此,我们承认客观外界对词汇的影响,但是,词汇并不是客观外界的影子,词汇在反映客观的同时,也要满足语用中的主观要求,一些人为因素直接影响词汇,造成词汇内部某些与客观不对应的变化。表达中,对受重视概念的表达需要造成衍余,而对所表达对象的忽略,导致了用语的经济现象。对于所表达的事物或概念在重视程度方面的差异,不仅决定了表达中单个形式的繁简,也决定了同义词汇成分数量的多少和新创词汇成分的分布。